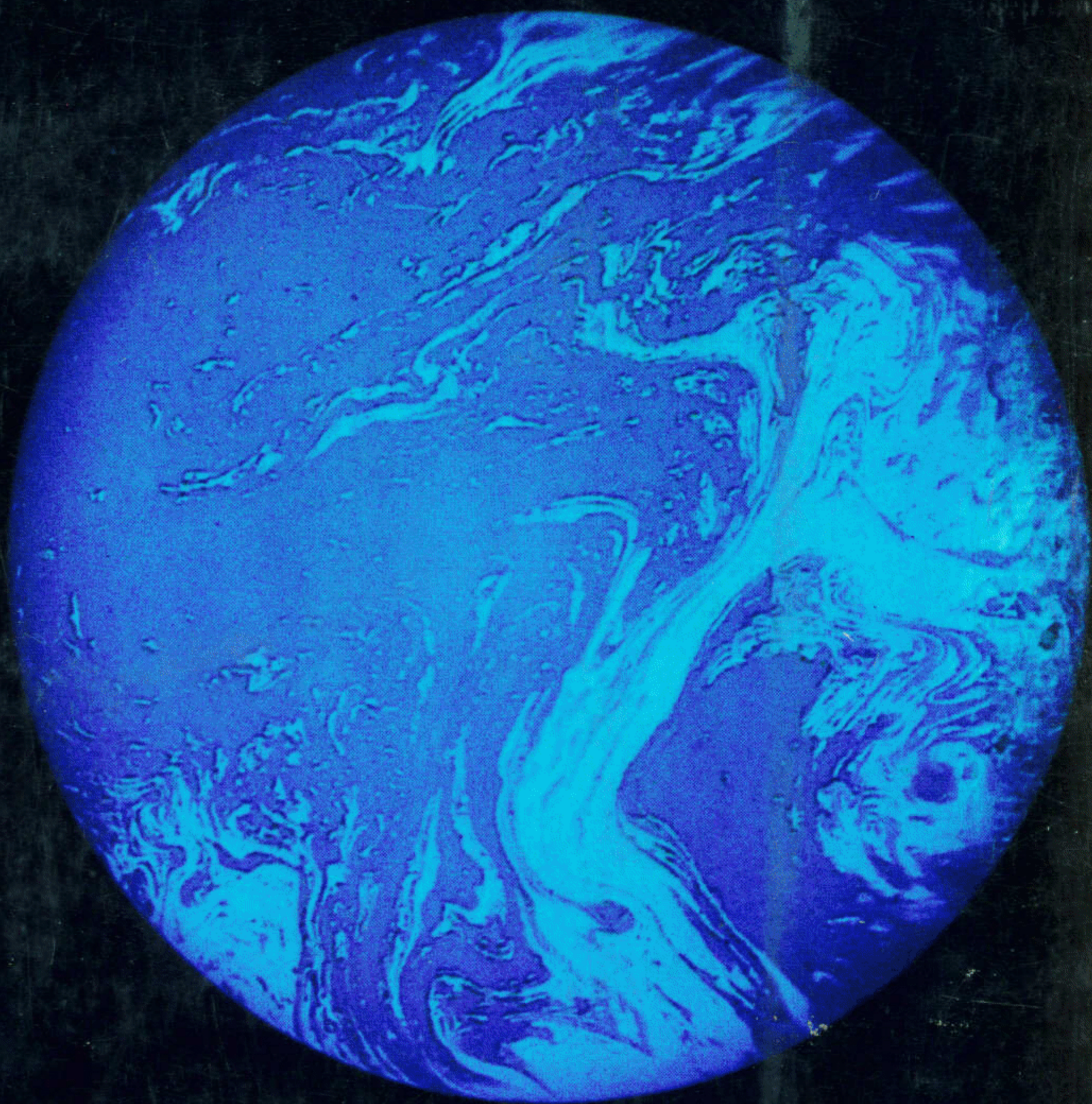


台港暨海外学界 论中国知识分子

汤学智 杨匡汉 编



主编 许明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顾 问 胡 绳 季羨林 张岱年 任继愈
汤一介 马 洪 冯 契 梁披云

主 编 许 明

编 委 会 (* 为常务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 王小盾	* 尤西林	* 许 明	刘月莲(澳门)
* 汤学智	乔仁毅	陈晓明	陈智英
* 杨匡汉	* 俞吾金	赵宪章	姜 涛
* 黄晓峰(澳门)		程炳生	谢维和

总 策 划 赵 燧

**本书出版得到海口赛达物业开发公司
董事长刘安先生特别资助**

编者弁言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曾说：“当某个社会被分为知识分子和大众两部分，产生了相互隔阂的时候，这预示着社会已经不健康了。”盖此善言，自然是生活在需要整体观念的时代对社会对人群的一种观照，一种世纪性的排拒疏远而寻求和谐期待。所有民族、所有人生的活动与表现该是互相依存的。试想，倘若知识分子一味狷介鸣高，谬托孤傲，以至丧失自身与社会、人生普遍性现实问题的切近；假如大众以流俗为满足，乃至失去一切人之子都应最大限度享受的知识的养育，那将会增添人际的反目，加深精神的裂痕，好端端的社会与人生舞台发生倾斜至劫持以去，斯可哀耳！任何一个数千或数百年抟成之民族，若是坚持前喻文化，都不免要让知识成为空气和阳光一样被人们共享，都渴望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知识者和大众不再产生阻隔，而在同一地平线上。

不过，知识分子作为有一定学养和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是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而成长，而历经三碰九磕、九曲十折地走着人生和心路的旅程。俄罗斯语所说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谓之“知识阶级”，曾领导完成过1917年的俄国革命。但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而言，知识分

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于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各个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重视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也排斥异己的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导源于宗法社会结构、科举制度，又渊源于知识者对自身的精神规定，中国知识分子在群体人格上，也表现出依附性大于独立性的普遍特征。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他们以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拥有和站在时代前沿的聪慧才智，成为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盛衰。因之，把知识分子视作今日之大众中有特殊价值的一部分，视作以民众生活为舞台而奉献于社会的优秀人群，并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此乃不刊之论，是毋需赘言的。

鲁迅有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这支撑着中国的“脊梁”中，就有很大一批是“士”即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士”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德性化人格追求。他们常常在“士”与“仕”的频繁之角色替换中，或成为事功中的立德者，或成为夹缝中的生存者，或成为苍茫中的求索者，或成为超越中的失败者。那些“达”而“仕”者，曾是“为生民立命”而乐此不疲；那些“穷”而“士”者，曾坚执于“德圣之绝学”而不拔；不“达”不“穷”、傲世游世而“悠然见南山”者，亦未必忘情于人世炎凉，自有“猛志固常在”的叹息热肠。自古至今，作为民族精英的中国真正的知识之士，尽管背负着艰难困苦的十字架，却始终以“如欲平治天下舍吾其谁”的拯救气概，一方面战战兢兢、寂兮寥兮地独善自身，以达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一方面博览诗书、精研史例以充实自我，以“知”作为经

世济民的资具。他们常常承受着入世与出世、外圆与内方、超然与介入的精神两难和隐性枷锁，有过奋取，有过彷徨，有过迫压下心灵久久的煎熬。然而，他们又似乎天然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然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天然地致力于同道与客体合一并蹈历于崇本息末的伦理和人格。一旦民族面临危机时刻，他们中的先锋就挺身而出，如先秦的大儒贤哲，西汉的太学生，魏晋的名士，唐朝的诗杰，宋代的理学家，晚明的东林诸友，清朝的六君子，乃至“五四”先知先觉的新青年和抗战的爱国志士等等，即是明证。那种起源于忧患意识的知识者的自觉，那种以“兼济”为襟怀、以“理想”为己任的理性，使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用血泪和智慧浇灌出株株道德为根、学养为茎的大树，维系了“智者尊严”，保持了智者活力，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精魂。中国知识分子唱过的种种悲歌和壮歌，自有其觉世传世、昭示来者的功用，那么，从不同侧面去总结与研究这份精神遗产，无疑会给当代知识者有益的启迪。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不仅受到大陆学人的重视，也受到台港暨海外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的关注。多年以来，在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探中，“士”也成为热点之一而有不少著述。自然，在对此一专题的研讨中，有些系廉价的论争，有些系出于偏见的歧解；但也确实有诸多执于平静与理智的历史深思和灵魂自救的文字，并体现出一定的学术功力。为了深化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我们特意从接触到的资料中遴选一批论文，其中无疑沉积着这些学人思维波动的或重或轻的碎片，可以深信，一切心胸宽阔的大陆读者，当会以水下折光视之，而不至于用先验的或简单化的脑筋，去戒拒这些于历史中进行的考证和于现实中生发的创见。

这部并非周全却已显得厚重的论集，编者所取的是史脉纵贯与定点横断相结合的遴选策略。所选篇目，是从人文科学的不同

视角去观察与剖析同一命题。从内容上看，又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即：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角色与使命；对士人精神和现代知识者品格的历史考察；对若干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与人格特征的解剖。这自然也包括知识者如何走出历史阴影和精神怪圈的学术性探讨，为的是鉴古而知今，给当代的人们提供一些不无价值的咨询。

在编定这部书稿的时候，我们想起了爱因斯坦半个世纪前致一位加拿大青年谈知识分子的著名信件。信中说：“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呀。尽管如此，可是科学家，由于他们勤恳的劳动，在消除那种摧毁人的偏见方面所作的贡献，比起政治领袖来还是要大些。我们不应当忘记，卡尔·马克思和列宁也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并且从知识分子那里吸取他们的力量。”（1936年4月20日）对此至当之论，今日的知识分子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索问：当我们从前人的轨迹中探寻未来的路向时，当看到社会上灯红酒绿，万头攒动，竞相“发家致富”，而“老九”们羞涩于“一箪食，一瓢饮”的困境时，能否以贞洁之心守静笃，致虚极，探真元？能否真诚如初地呕心沥血，浩气永存？能否做到诱惑愈多而愈能慎独守中，聚人类之学养，发民族之慧光，以独特的思想文化创造，令我中华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新昂首？

卑微者自有无价的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为中华民族必可企及的文明高度奉献一切。即使为世风所蚀、为世俗所息，我们毕竟还有下个世纪再一次接力式的行进。

1993年9月识于北京方庄桥

中国知识分子（节录）

钱 穆

我在前两篇⁽¹⁾分析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文字中，屡屡提到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该特别加以叙说。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不能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于精光凝聚，短处则在无横溢四射之趣。姑置邃古以来，从春秋说起。其时文化已开，列国卿大夫如鲁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孙穆子，齐之管仲、晏婴，卫之蘧伯玉、史鳅，宋之公子鱼、子罕、向戌，晋之赵衰、叔向、韩宣之，楚之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子产，吴季札，秦百里奚、由余，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非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但

他们亦不能撇开人事，以往向广大宇宙，探索自然物理。因此他们既无西方宗教性格，亦缺乏西方科学精神，而在人文本位上已渐渐到达一融通开明之境界。此后战国平民学者崛起，贵族阶级突然陵替，其间并无贵族平民两阶级间之剧烈斗争，而列国封建经两三百年的过渡，即造成秦汉大一统。此等历史业绩，推溯根源，春秋时代贵族学者之气度心胸，与其学识修养之造诣，亦与有大功。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战国学者多从平民阶级崛起，但当时距春秋不远，他们在生活上，意识上，几乎都沾染有浓厚的贵族气。他们的学术路向，依然沿袭春秋，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同时都对政治活动抱绝大兴趣。在上的贵族阶级，也多为他们开路，肯尽力吸引他们上进，他们亦几乎多以参入政治界为发展其对人生社会之理想与抱负之惟一途径。而讲学著书，乃成为其在政治上不获施展后之次一工作。孔子专意讲学著书，乃属晚年事。墨子亦毕生在列国间奔跑，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都是忙于希求参加政治活动。孔、墨以下，此风益甚。总之他们的精神兴趣，忘不了政治。即如庄周、老聃，最称隐沦人物，但他们著书讲学，亦对政治抱甚大注意。即算是在消极性的抨击政治，亦证明他们抛不掉政治意念。此亦在中国历史传统人文精神之陶冶下所应有。我们姑称此种意态为上倾性，因其偏向政治，而非下倾性，因其不刻意从社会下层努力。在当时，列国交通，已形成一世界型的文化氛围。如陈仲子之类，即使埋头在小区域里，终身不顾问政事，但风气所趋，大家注意他，依然使他脱不掉政治性。政治的大门已敞开，跃登政治舞台，即可对整个世界（全中国）全人类作文化上之大贡献，那得不使这一批专重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跃跃欲试？

他们的生活与意气亦甚豪放。孟子在当时，最号称不得意，但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所见如梁惠王，齐宣王，

都是当时最大最有权势的王者。若肯稍稍迁就，不在理论上高悬标格，何尝不是立谈便可至卿相。在百万大军作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此种人物与意气，使后代感为可望而不接。无怪战国一代，在中国史上，最为后代学者所想慕而乐于称道之。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总看不起象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始一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知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之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知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则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不仅自然科学为然，即论政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中，亦决不该为政治而政治，政治脱离人文中心，连一技一艺都不如。张仪公、孙衍之徒，所以为孟子极端鄙视，其意义即在此。而孔、墨、孟、荀，又将为荷蓑丈人及庄周之徒所诽笑，其意义也在此。当知庄周等看不起儒、墨政治活动，亦由人文中心着眼。只在其对人文整体看法与儒、墨不同，其实是仍站在人文圈内，并非站

在人文圈外根据超人文的眼光来批评。如是则级级提高，一切知识与活动，全就其对人文整体之看法而衡量其意义与价值。因此在中国知识界，不仅无从事专精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之理想，并亦无对人文界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因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将是执偏不足以概全，举一隅不知三隅反，仍落于一技一艺。而且属于自然科学之一技一艺，尚对人文整体有效用；若在人文事业中割裂一部分专门研求，以一偏之见，孤往直前，有时反更对人文整体有害无益。孔门弟子，如子路治兵，冉求理财，公西华办外交，皆有专长，但孔子所特别欣赏者，则为颜渊，颜渊不象是一个专才。墨家对机械制造、声光力学，都有相当造就，但墨子及墨家后起领袖，仍不注重在这些上。战国很有些专长人才，如白圭治水，孙吴治兵，李悝尽地力之类，但为知识界共同推尊蔚成风气者，也不是他们。当时知识界所追求，仍是关涉整个人文社会之全体性。若看准这一点，则战国知识界，虽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于下层之全体民众。他们抱此一态度，使他们不仅为政治而政治，而且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政治。因此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有时合不拢。纵使“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政治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政治中抽身退出，再来从事讲学著书。但他们在其内心想望中，仍不放弃政治，仍盼望终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在政治上实现。此种态度，即庄周、老聃亦不免。他们一样热望有一个理想政府与理想的政治领袖出现。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面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色。

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

积极理想作工具，此一人文理想则从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推阐寻求得来，此一精神，在春秋时代尚是朦胧不自觉的，只有到战国，始达成一种自觉性的境界。他们的政治理想，乃从文化理想、人生态度中演出，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之一支。这一理想，纵然不能在实际政治上展布，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主要的则是他们的个人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孔子《论语》中已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以其同属文化人生之一支。因此期求完成一理想人，亦可即是完成了一理想政治家，这是把政治事业融化到整个人生中而言。若单把政治从整个人生中抽出而独立化，即失却政治的本原意义。要专意做一个政治家，不一定即成为一理想人。《大学》直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贯之，而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亦说“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亦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此种理想，必先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始可在各个人身上实现。若这一套文化理想，并不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哪有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之理？因为各个人只是各个人之集合，没有各个人，即不会有各个人。人生本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换言之，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这一工夫，先从各个人自身做起，此即所谓修身，所谓挈矩之道。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此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

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根据此一观念，凡属特殊人格，凡属自我一范畴自成一典型的人格，其所含普通性愈小，即其人格之理想价值亦愈降。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实际内容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在寻求出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在特殊人格上之这一根本观念，则并无二致。而此种理想的普通人格，则仍从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即人文精神中，籀绎归纳而来，此层在儒、墨、道三家亦无二致。如是，则我们要做一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最高人格，即是最普通的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际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至于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此下标准知识分子一特色。战国学者在理论上自觉地为中國此下知识分子描绘出此两特色，遂指导出中国历史文化走上一特殊的路向。

二

西汉学者，在其传统精神上，并不能违离战国，但就当时社会形势所影响于知识分子之意趣与性格上者，则显然与战国不同。战国是在列国纷争中，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无一定法制一定轨辙的束缚。穿草鞋戴草笠，亦得面谒国王，立谈之顷攫得相印（如虞卿）。那时不仅国王礼士，一辈贵族公子亦闻风向慕，刻意下士。当时知识分子，成千累万，冒昧走进王公大人门下作客，可以要求衣丝乘车带剑闲游的待遇。战国学者在理论上是严肃的，已是

自觉性的超越了春秋时代的一辈贵族；但在生活上，是放纵的，浪漫的，豁达而无拘束的，转不象春秋时的贵族们有一传统典型。但他们虽意气高涨，他们的实际生活，却依存于上层贵族，以寄生的形态而存在。他们总脱不了周游天下，朝秦暮楚，一纵一横的时代习气与时代风格。秦汉大一统政府成立，封建贵族逐步消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于是学者气焰，无形中抑低了。此种形势，到汉武帝时代而定。首先对此发慨叹者是东方朔。他说（答客难）：“彼一时，此一时。”时代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机会，哪能与战国人相比？其次有扬雄，他说：（解嘲）“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叫战国学者生在这时，他们也将感无可活动之余地。再次是班固，他说（答宾戏）：让我们学颜渊的箪食瓢饮，与孔子的获麟绝笔吧！至于鲁仲连、虞卿之徒，那是偶然时会，哪能效法呢？他们在心情中，尚记忆着战国的一套，但在时势上则知道学不得了。他们的生活，多半是回到农村，半耕半读。公孙宏牧豕，朱买臣樵柴，西汉读书人大抵在农作余暇中，一年三个月的冬季，聪颖特达的自己说三冬九个月的时间就够用了。一般说来，从十五岁能识字读书到三十岁，经历了十五个冬季四十五个月的长期累积，必待到三十岁始成得一通才。他们再也不想裹着粮，肩着行李，象战国游士般到处瞎闯。时代变了，他们从县学开始到国立大学，毕业后回到本乡，埋头在地方行政衙门当一小职，有成绩的，再获选拔升送中央，在王宫当一侍卫，平时在殿廷中执戟鹤立，遇皇帝出游，结队骑马随从，然后再由此转入仕途。所以西汉学者的出身，是乡村的纯朴农民，是循谨的太学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务员，是察言观色的侍卫队。如此循循妮妮，再说不上奇伟非常特达之遇。而因此却造成西汉一代敦笃稳重谦退平实的风气。

但历史上的战国遗风，终于在他们脑子里忘不了。战国学者

常把自己当圣人，做了圣人便该做明主。那时的国王，也真会三推四让，把至尊的宝位让给他，他亦不敢老实坐下不客气。至于当王者师，做大国相，那已是等而下之。西汉学者不然，自己地位低了，专把孔子捧得天般高，把孔子神圣化，孔子是他们的教主，他们因此也好要求王者同样尊奉他们的教主。如此来把王者地位和他们拉平。学术定于一尊，亦是学术界自身要求，不是皇帝力量所能强。一到汉业中衰，皇室威信堕落，他们终于拥戴出一位学者身份的贵族来，迫汉朝把皇位禅让给他（王莽）。那是学者气焰重张的机会，不幸其人及身而败，汉王室再起，西汉学者终于对战国士运徒作了一番憧憬。

东汉士风，又与西汉不同。王莽是太学生，汉光武帝也是一个太学生，这已使东汉学者在内心上发生了异常的形象。而且从西汉中晚以来，社会学风急速发展，到处结集数十乃至几百学者聚在一大师门下从学，是极平常事，一个大师毕生拥有上千门徒的不算奇。学者在下层社会渐渐占有地位，有些偃蹇不仕，再不想入宦途。王莽末年的龚胜，光武初年的严光，更是后代中国知识分子另成一格的两种典型人物。高尚不仕，是东汉仕风一特色。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定只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是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穉、黄宪，举世风摩，备受倾倒。东汉学者的基本情调，还是农村的，而渲染上大都市集团社交色彩。他们没有西人那样纯朴厚重。也不象

战国人那样飞扬活跃，他们却有春秋时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贵族式，或官僚式的，而东汉则成为平民式的，书生式了。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象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象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蔑视政治权力，淡置一旁。那时是名胜于爵，政府的爵禄，敌不过社会的名望。君臣关系远逊于朋友。他们的人生，成为一件艺术品，却经不起风浪，耐不起战斗。政治急速腐败黑暗，社会上远有清名高节，相形之下，激起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斫丧殆尽，而东汉也随踵灭亡。

其实那种书生贵族，不仅在学者们意识形态下养成，也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平行向前。东汉末年，门第世家已露头角。因世代书生而变成了世代官宦，经过大扰乱的磨练，书生都转成了豪杰。于是三国时代又成了一种特殊风格。三国，却俨然是一小段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居国君、丞相、元帅、外交大使之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及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成为历史佳话，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整个三国人物，都不脱书生气，同时也不脱豪杰气。东汉传统的名士气，象孔融、管宁（那是名士之两型），为时势压迫，掩抑不彰。西晋，局势渐定，名士传统抬头复起。此下东晋南朝，偏安江东，沿袭东汉名士一派，五胡北朝，陷落在异族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则上越三国而远接西汉，在淳朴中带豪杰气，但双方同在大门第背景下而与两汉三国异致。

三

门第逼狭窄了人的胸襟，一面使其脱离社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占了特殊地位，一面又使其看轻政府，觉得国运不如家运之重要，此种风气在东晋南朝尤为显著。北朝则处境坚困，为求保全门第，一面不得不接近下层民众扩大力量，一面不得不在政治上努力奋斗，争取安全。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作成一种守先待后之坚固壁垒。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大激荡中作中流砥柱所不可磨灭之功绩。

远在战国时代，中国学者对人文理想已显然划出两大分野。儒、墨比较更富上倾性，而道家庄周、老聃一脉则转向下倾，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朴，挽回结集城市的知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此种转换，越后越显著，东汉更是一转折点。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分鼎立的，不是君臣名分，而是朋友间的道谊私情。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与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草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可见三国时代依然是道家作底，儒家作面，依然沿接两汉旧轨道前进。到两晋，此一姿态更显白了。从个人主义开门是朋友，关门则是家族。道家思

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老庄。黄老尚带政治性，老庄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之内在精神，渲染上太学大规模的都市社交，便变成东汉型。渲染上黄巾、董卓之大动乱，便变成三国型。渲染上托庇在小朝廷的暂时苟安，门第鼎盛的环境下，便变成魏晋清谈与东晋南朝型。朋友也是个人主义，门第家庭仍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种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儒、墨为大社会人群建立理想，悬为奋斗目标，明知其不可为而仍为之的一种带有宗教热忱的，这是战国精神。现在则如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孤悬起一轮凄清的明月，在荆棘蔓草丛中浇培出一枝鲜嫩美艳的花朵。把农村情味带进繁华都市，把军国丛脍忍辱负重的艰危政府来山林恬退化，把华贵堂皇养尊处优的安乐家庭来自然朴素化。那是当时的大喜剧，亦可说是当时的大悲剧。

北方门第绝无此心情，亦无此可能之环境。艺术人生不可能，逼得他们回头再向宗教人生；田园人生不可能，逼得他们回头再向政治人生。老庄避向南方，北地则仍回到孔子。他们吸集社会力量来争取政治，再凭藉政治力量来争取社会。他们意想中不可能有个人，不可能有家庭，除非在大社会中建立起一个合理政府，才能安顿他们的个人与家庭。北方门第形成了另一种的淳朴、另一种的天真。南方社会在农村而园林化，北方社会则在硃确不毛的地面上来耕垦播种，在洪荒而田野化。异族统治终于推翻，隋唐盛运终于再临，拨乱反治，否极泰来，那是北方士族的功绩。

这里有同一契机，却使南北双方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向新宗教，即对印度佛教之皈依。个人主义者则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逃避现实，寄托心神；集团主义者则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刺激新生，恢复力量。南方以空寂精神接近佛教，北方以悲苦精神接近佛教。而其间仍有一共同趋向，佛教进入中国，依然是上倾